

## 波戈金、佩平与官方民族性

朱建刚

(苏州大学, 苏州 215006)

**提 要:** 俄罗斯历史上的“官方民族性”曾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彼时的政治、外交、文学文化等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佩平院士在1873年曾对“官方民族性”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 由此招致著名史学家波戈金的反驳。“官方民族性”正是在这场争论中越发显出它的特色及意义。

**关键词:** 波戈金; 佩平; 官方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1873年, 著名革命民主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表弟, 后来的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佩平(А.Н. Пышин 1833—1904)出版了名为《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文学观特征》的著作, 该书第三章即以官方民族性命名: “传统的因素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上升到了完美真理的高度, 似乎成为一种以民族性命名的新体制。”(А.Н. Пышин 1873: 63) 作为一名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佩平对官方民族性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把这一时期(1820—1850)俄国内政外交上的失败(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统统归咎为官方民族性在内部秩序、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诸多不足。并且, 在佩平看来, 官方民族性与斯拉夫派实际上是一回事。“说实话, 体制(即官方民族性——引者注)常常并不认可斯拉夫派(同样它也不喜欢‘思想’), 但其实质时有相同之处, 因构成其整体观点主要部分的是忠诚、保守主义、民族独特性及或多或少对欧洲的敌视态度。”(А.Н. Пышин 1873: 87) 佩平的这种论断引起了保守阵营的强烈不满, 年逾古稀的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波戈金(М.П. Погодин 1800—1875)立刻撰文《论斯拉夫派》予以反驳, 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官方民族性的再度反思。从今天来看, 佩平的认识存在着许多曲解, 然而, 恰恰是佩平在争论中的观点及态度直接影响到了整个苏联时期对官方民族性的接受, 也影响到了波戈金等保守派人士在苏联时期的接受。因此在介绍这场争论之前, 不妨先让我们回到1832年——官方民族性<sup>1</sup>的诞生之年, 看看它的本来面目。

### 2 官方民族性: 背景与内涵

目前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 官方民族性的详细阐释最早见于1832年乌瓦罗夫(С.С. Уваров)作为莫斯科学区教育督办时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的呈文当中。此后在1833年他升任教育大臣时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加以整理完善。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官方民族性呢?

众所周知, 1830年代在俄国历史上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发生, 但如果往前推几年就不难发现: 第一是1812年沙皇俄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打败了入侵的拿破仑。其

次，1825年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事件，导致继位的尼古拉一世深受刺激，对十二月党人及其主张的西方启蒙理念十分警惕。起义失败之后，尼古拉一世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建立了第三厅，设立书刊检查制度，自亚历山大一世以来的自由主义氛围为之一变。

直到18世纪末，俄罗斯在西欧人的眼里仍然是“化外之民”的形象。虽然彼得大帝改革已经让俄国在学习西方的近代化大路上狂奔了一百多年，启蒙运动的大师如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虽也受邀去过俄罗斯，但多半是带着传经授道的使命感去的。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干脆就认为：“俄国人民还没进步到开化的地步”（卢梭 2003：58）事实上，当时的俄国统治者对西欧也确实存在着崇拜的情结。一味推行西化的彼得大帝自不必说，他之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都对法国或英国充满了羡慕。因此，可以说自17世纪末以来，俄国的国策就是学习西方（尤其是法国），首先是科技，而后是政治思想和文化。启蒙运动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使得俄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崇尚西欧文化的精英人士。这一西化的浪潮到1812年卫国战争结束后突然有了转向。

在入侵俄国之前，拿破仑所在的法国几乎是欧洲唯一强国，只有英国靠着英吉利海峡负隅顽抗。拿破仑的希望就是击败俄国，从而使英国放弃抵抗的希望，统一全欧洲。然而这个梦想在俄罗斯的严寒和莫斯科的大火面前破灭了。俄罗斯人的顽强和英勇把欧洲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正如美国史学家巴巴拉·杰拉维奇所指出的：“从十分现实的意义来看，俄国通过与拿破仑的战争收获不小。首先它从头号强国的覆灭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其次，俄罗斯帝国又增加了新的领土。”（巴巴拉·杰拉维奇1978：31）不过除了现实的收益外，1812年卫国战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俄罗斯人的心态：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是俄国学习榜样的西欧，尤其是超级大国法国，居然被自己打败了。这种心态的改变，甚至导致了沙皇在维也纳会议上“有一种得意、神秘、甚至以救世主自居的情绪。”（梁赞诺夫斯基 2007：292）正是这种沾沾自得的情绪影响了亚历山大一世晚期的改革政策，使他从年轻时代的启蒙信徒转变成一位专横、保守又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君主。也因为如此，佩平在论及官方民族性起源时认为它并非始自尼古拉一世，而是源自亚历山大一世晚年。

1825年12月1日，亚历山大一世在滨海小城塔甘罗格突然去世，随后的12月26日，一批贵族军官带领三千余名士兵在圣彼得堡发动了兵变。虽然兵变很快被镇压，但诚如伯林所言：“十二月之变，沙皇尼古拉一世毕生耿耿难以释怀。”（以赛亚·伯林 2001：9）作为君权神授的皇帝，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意味着对沙皇神圣地位的挑战，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这种行为缘何产生，这是尼古拉一世极力要搞清楚。12月29日，根据沙皇旨意成立了以陆军大臣塔吉舍夫（А.И.Татищев 1763—1833）为首的“有害社会思想审查委员会”，对有关人员进行详尽的调查。1826年5月，沙俄政府结束了对十二月党人的调查，发表了“调查委员会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了西方思想对十二月党人的影响。同年7月13日，在处死五位十二月党人的同时，尼古拉一世发表了审判国家罪人的宣言。宣言特别强调防止有害思想的侵袭，告诫父母要注意对子女的道德培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国家的道德基础，便是“基于人民自然品质的对于教会的爱、对于皇帝和国家的忠诚。”（白晓红 2006：32）

官方民族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来。1832年12月4日，乌瓦罗夫向尼古拉一世递交了《莫斯科大学考察报告》，其中分别涉及了道德状况、教学及大学的普遍风气等问题。乌瓦罗夫认为：俄罗斯学生本质上是好的，但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的腐蚀。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教育，在于对现存教育情况做必要的改变。比如要在学校里加强东正教教育，增加俄罗斯历史的教学课，让学生通过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这样才不至于轻易成为西方思想的俘虏。乌瓦罗夫说：“正确的、可靠的教育在我们的世纪是必要的，它伴随着深深的信念和温暖的信仰，东正教、专制和人民性那些真正的俄罗斯保守因素已成了我们社会的伟大事业最后的一线希望、最可靠的力量保证。”（С.С. Уваров 2014：326）

在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这三原则中，前两者的概念比较明确，也比较重要。乌瓦罗夫很重视基督教，他甚至提出：“严格地说来，只有两种文学、两种思想的脉络、两种文明：基督之前的古代文明和基督之后的现代文明。”（Nicholas Riasanovsky 1961: 84）他进一步指出：只有东正教（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才是人类和社会道德与文化发展的基础。相对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西欧启蒙思想横扫一切的状况，乌瓦罗夫为俄罗斯的稳定感到庆幸：“幸运的是，俄国保持着对救世因素的热忱信仰。没有这些救世因素，俄罗斯就不可能过上幸福生活、强大起来、生活下去。”（С.С. Уваров 2014: 135）不难看到，乌瓦罗夫是把东正教的存在看作是俄国在精神上优于西欧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这种对东正教优越性的强调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俄国宗教史。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也认为：“在俄罗斯民族的深处蕴含着比更自由更文明的西方民族更多的精神自由。在东正教的深处蕴含着比天主教更多的自由。”（徐凤林 2006: 20）但就乌瓦罗夫本人而言，他并非虔诚的宗教徒，对于东正教也没有从理论上进行非常详细的论述。他只是提出了要把东正教作为俄国精神源泉这一命题，以此贯彻到学校教育和文学创作中去，从而与西方的启蒙思想进行抗衡。针对东正教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是由后来的波戈金及斯拉夫派等完成的。

专制是保证俄国政治稳定的基础。乌瓦罗夫说：“君主专制构成了俄国政治存在的主要条件。俄罗斯这个巨人屹立于此，就像屹立在自己伟大的奠基石上一般。陛下的无数臣民都感受到这一真理：尽管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与政府关系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一切。救世的观念——即俄罗斯生活在强大、仁慈、开明专制精神中并受此保护——应当深入到国民教育中去并与之发展。”（С.С. Уваров 2014: 135）专制并不等于“暴政”，相反东正教观念下的君主专制可以令不同阶层的臣民受到保护、得到发展。这种观念，在后来的斯拉夫派思想家霍米雅科夫（А.С. Хомяков 1804—1860）、萨马林（Ю.Ф.Самарин 1819—1876）等人的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

关于民族性，乌瓦罗夫的定义并不明确：“民族性不在于往前走或停顿，它不要求思想的停滞。国家的组成就像人的身体，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变化外貌，面容（черты）每年都变，但面貌（физиономия）不会变。”（С.С. Уваров 2014: 136）笔者的理解：乌瓦罗夫笔下的人民性实质上是宗教性和专制性的合二为一，具体到生活中，民族性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但主要体现为人民对东正教的虔诚与对沙皇的忠诚。这一点和当时别林斯基等人强调启蒙思想的论述有很大不同。<sup>2</sup>甚至可以说，乌瓦罗夫的官方民族性是一种反启蒙的理论。在阐释了宗教性和专制性的基础上，乌瓦罗夫对俄罗斯民族的定义是：“俄罗斯民族不是一个种族（этнос），而是以对自己政权的无限忠诚联合在一起的文化共同体（сообщество），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民族完全区别于受启蒙主义堕落哲学影响的西方民族。”（А. Зорин 1996: 138）

除了理论上的论述之外，乌瓦罗夫还陆续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以强化俄罗斯社会的民族认同感，比如对以启蒙思想为主的私立学校教学招生设置诸多限制；通过1835年的大学章程取消了高校的自治权利；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但提高了教授的待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首次在大学哲学系建立了俄国史、俄国文学、俄国文学史教研室，进行本民族文化的宣传工作。

乌瓦罗夫毕竟深受欧洲启蒙精神熏陶，并不是顽固的蒙昧主义分子，这就决定了他鼓吹官方民族性的最终目的并非要回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的愚昧、落后状态。从今天来看，“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这三原则并非通常所谓的反动或蒙昧主义手段，它既有现实的意义，即保证俄国远离欧洲革命动荡；又有文化上的意义，对这三原则的强调显然也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这两种意义互为因果：为了避免革命，所以要强调民族特性；俄罗斯民族的特性保证了它能远离西欧的革命动荡。如此公开声明自身与西欧的不同，这在整个俄国历史

上恐怕也是第一次。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官方民族性之外，十九世纪初的沙皇政府为了塑造自身国际形象也费力甚多。针对法国作家、旅行家居斯廷（А. де Кюстин 1790—1857）在《1839年的俄国》一书中描绘的专制、粗鲁、野蛮形象，尼古拉一世除了迅速将其列为禁书之外，还以官方名义邀请了普鲁士学者哈克斯特豪森（August von Haxthausen 1792—1866）赴俄考察半年，最终在沙皇的资助下出版了两卷本的《俄罗斯帝国》，以对抗居斯廷著作的消极影响。

### 3 波戈金及其对官方民族性的阐释

波戈金是莫斯科大学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俄国历史学教授，他的教授职位即是乌瓦罗夫为了弘扬俄国文化、宣传俄国历史而提出设立的。因此，在佩平及此后的研究者看来，波戈金自然而然就是“官方民族性”思想最鲜明的表现者。”（Н.И. Казаков 1989：7）不过，从历史上来说，波戈金一生身兼多职，著述等身，门生众多。尽管思想保守，又与沙皇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官方民族性的吹捧者。波戈金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对官方民族性的理解和阐释首先是通过他对俄国历史的研究来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学生之一，后来著名的斯拉夫派代表萨马林才深有体会地说：“在波戈金之前，俄国史的主流趋势是在本国历史中寻找与西欧民族类似的内容以作对比。据我所知，波戈金至少是第一个对我和我同伴指出有必要用俄国自己的标准解释俄国史的人。”（Н.П. Барсуков 1891：4，5）独特的历史自然需要独特的标准来衡量。萨马林在此所强调的“俄国自己的标准”实际上即以此前波戈金再三强调的俄国历史独特性为基础。

自1830—1870年代，波戈金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如《论世界通史：就任帝国莫斯科大学正式教授时的发言》（1834）、《历史格言》（1836）、《俄国史与西欧国家史的相似性，关于起源》（1845）、《彼得大帝》（1846）以及晚年所写的《论斯拉夫派问题》（1873）来讨论俄国历史的独特性。概括地说，波戈金对历史有两个主要论断：一，历史是有规律的；二，俄国历史自有其独特性（即所谓“两个欧洲”的学说）。波戈金指出：“一切哲学体系都只是思想的片面发展，所有的体系组成了一个逐步发展的整体。”“真理只有一种，但所有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它。”（М.П. Погодин 2010：119）上述观点明显受到19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俄国历史的独特性是波戈金极力强调的，从而为强调俄国文化特殊性作铺垫。在《俄国史与西欧国家史的相似性，关于起源》这篇文章里，波戈金开篇就说：“西欧国家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为征服，它决定了此后的一切历史，直至现在。”（М.П. Погодин 2010：250）作者引用了法国史学家梯也尔的一段话，结合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证明英法史学界对这一观点的普遍认同。有压迫者必然有反压迫者。在波戈金看来，西欧各国出现的封建主和农民阶级的对抗一直发展到现在法国大革命对暴力王权的颠覆，正是暴力征服的必然结果。这种暴力滥用的结果，最终必将导致西欧的衰落。正如波戈金用三部曲来归纳的：“征服、阶级分化、封建制度，有中产阶级的城市，仇恨、斗争和城市的解放——这是欧洲三部曲的第一幕悲剧。专制政体、贵族阶级、中产阶级的斗争、革命——这是第二幕。法典、底层阶级的斗争——听天由命的未来。”（М.П. Погодин 2010：252）

但沙俄帝国自有国情在此，波戈金是从历史、地理和道德三方面论述俄国历史特殊性的。仔细说来，这三方面实际上与乌瓦罗夫所持的三原则非常接近，可以说把后者没有说清楚的一些问题从历史根源上予以澄清了。“从第一眼我们就注意到，在俄国历史的因素中绝对没有一点西方历史的形态。没有阶级分化，没有封建制度，没有可以躲避的城市，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奴隶制度，没有仇恨，没有荣耀，没有斗争……说真的，我们有编年史的美好传说，我们的国家并非始于征战，而是邀请的结果。这是区别之根源！西方的一切源自征战，而我们却来自于邀请、无条件的占有、满怀爱意的约定。”（М.П. Погодин 2010：252）由于俄国历史的开端是和平的，最初的留里克大公和奥列格大公都是“受邀而来和平的客人，人民希望的保卫者”（М.П. Погодин 2010：254），因此他们与人民、与贵族的关系也是比较和

谐的。波戈金接下来详细分析了大公与贵族、与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为自己所坚持的“诺曼起源说”做论证；另一方面也是强调沙皇专制在俄国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点，波戈金突出强调俄国空间巨大、人口分散等特点，以强调俄国专制的必要性。这一点在后来的史学家索洛维约夫（С.М. Соловьев 1820—1879）的著述中也多有提及，常被用以强调对沙皇专制在思想上的支持。第三点，波戈金强调的是道德上与西方的差异，这主要涉及到基督教的问题。在波戈金看来，“瓦良吉人接受了基督教并将其在斯拉夫人中传播开来，后者接受它也是根据自己的本性，并无阻碍，而在西方这一切正好相反。我们是外来者向本地人推广宗教，西方则是本地人向外来者推广。并且，我们接受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对立的东方信仰，西方的信仰来自罗马，我们的则来自君士坦丁堡。此处并非展示两种教会之区别的地方，我们只指出与上述政治区别相对应的一些情况。西方更努力向外，东方努力向内；他们有出卖，我们有保护；他们有运动，我们有安宁；他们有拷问，我们有宽容。因为致力于外，所以西方教会有必要与世俗政权争斗并有一段时间高居其上。我们则致力于内，放任世俗政权为所欲为。”（М.П. Погодин 2010：263）必须要承认，尽管波戈金在论述中对俄国历史做了不少美化，但他所指出的俄国史与西欧史的不同也确实存在。西方是以宗教征服了西欧野蛮民族的基督徒；俄国则是在 988 年由弗拉基米尔大公主主动接受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经历了罗斯受洗之后成为欧洲文化的一分子。这两者的主动被动关系不同，最终侧重点也不一样：西方强调外向型的暴力征服，俄国则讲究内向型的道德精神完善。因此，在波戈金看来，俄国历史的特殊性就为官方民族性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当然，不能说俄国东正教果真如波戈金所说，充满“安宁”“宽容”等等，但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前，俄国东正教与世俗政权确实存在着某种平衡。彼得的改革打破了上述平衡，也使得俄国与西欧两种史观在俄国进入一个矛盾对立、平行发展的时期，即俄罗斯的所谓“欧化时期”。当然，这种平行发展是以社会的极大分裂为代价的，即上流社会奉行西欧史观，而底层民众则维护着传统的斯拉夫史观。这就涉及到史学家对彼得大帝的评价问题。波戈金在 1846 年第 1 期《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彼得大帝》的文章，列举了俄国社会生活因彼得改革而发生的诸多改变，赞扬了彼得对俄罗斯的再造之功。“他看到了一切，想到了一切，干涉一切，赋予一切以动力、方向或生命。我重复一遍：无论我们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更难或更易，更远或更近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他是钥匙或者锁。”（М.П. Погодин 2010：233）波戈金继而认为：彼得大帝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但不能把今天所有的崇洋媚外都归咎于他。此外，如果说彼得大帝为俄国历史开辟了欧化阶段的话，那么尼古拉一世则在乌瓦罗夫的三原则之后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民族化时期。在稍后出版的《俄国历史札记》中波戈金又重申了这一点：“亚历山大一世确立了俄国对欧洲的优势，终结了俄国历史的欧化时期；沙皇尼古拉的统治则开始了独特的（民族主义）时期。”（М.П. Погодин 1846：34）换言之，尼古拉一世开始关注俄罗斯民族自身的特性，不再像以前的沙皇那样一味崇尚西方了。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波戈金对官方民族性是肯定的，他从历史的角度对官方民族性做了深入的阐释和论证。这些论述不仅把官方民族性与俄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为此后某些斯拉夫派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他与斯拉夫派的这种联系直接为 1873 年佩平对他的批判埋下了伏笔。

#### 4 佩平对官方民族性的理解

亚历山大·佩平在那本《从 20 年代到 50 年代的文学观特征》中虽然对官方民族性做了彻底的批判——甚至作为一名知名的西方派，他也顺带批判了斯拉夫派，但实际上，佩平批判官方民族性的最终目的在于否定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否定整个沙皇专制制度。只不过在 1873 年这个时候，有些话不能说得过于直白，佩平只能先从舆论出发，把作为沙皇政府意

识形态的官方民族性批倒。作者首先指出了它的重要性：“要谈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必须对官方宣称的民族性有概念。因其构成了思想生活发展之基础。这一思想生活对于文学与科学而言是必须的。”（А.Н. Пыпин 1873: 63）不过，何谓“民族性”？应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它呢？佩平接下来做了详细的论述。他首先定了调子：“许多优秀的同时代人早就开始怀疑这一体系的‘民族’特征了。他们认为官方民族性满足了大众的忠诚；但又认定：在更宽泛意义上官方民族性完全不是民族的。因为就其独特性而言，它没有给民族思想和物质力量的发展提供出路，使得绝大部分人民处于奴隶制下；最后，即使是其中占主流的也是借自西方的反动观点。”（А.Н. Пыпин 1873: 65）佩平在这里所说，其实包括了一个前提：所谓“民族”的，须是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据这个基本立场，他在后续论述里分别以外交、内政、宗教、教育、文学等一系列的事实来证明官方民族性的失败，即沙皇制度的失败。

在佩平看来，俄国曾是欧洲的拯救者，然而克里米亚战争却揭示了一个悲伤的事实：英法、撒丁王国、土耳其、奥地利、保加利亚等许多国家都对俄国以怨报德。根本原因在于官方大肆宣传的“东正教、专制和民族性”事实上没有得到欧洲各国的承认，官方第一次塑造的自我形象并不成功，“‘民族’因素只是赋予外交政策一种虚假而教条的形式。”（А.Н. Пыпин 1873: 65）再看内政问题。官方民族性强调的“专制”事实上也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沙皇制度出于独裁的需要，强调中央集权，扼杀了社会舆论参与社会改革的活力。尼古拉一世所仰仗的官僚机构又思想僵化，不思进取，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由沙皇及其官僚管辖的东正教会同样如此，限制共济会及圣经阅读团体，对分裂教徒的管理越发严格。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事业止步不前，所谓的“人民教育”只是停留在上层社会中，农奴制的存在使得绝大多数农奴根本不可能上学。相应地，大学教育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沙皇及官僚们对大学自始至终充满警惕，禁止在大学开哲学课，以防大学成为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对于高层的这种认识，即便是开明如乌瓦罗夫者，即便他身居教育大臣之高位，但也无计可施。

在佩平看来，官方民族性对俄国整个文化界也有诸多消极影响。公共舆论因缺乏言论自由而导致衰落，如果说彼得大帝时代还因为学西欧，社会舆论可以对俄罗斯生活陋习提出诸多批判，那么到了尼古拉一世的时候，对独特性的过分尊崇已经使得许多人不敢公开嘲笑或批判俄罗斯生活了。（果戈理写了《钦差大臣》，意在为官僚阶级照照镜子出出汗，结果遭致后者的全面抨击，使得果戈理出走国外，多年不归。）原因就在于官方民族性是俄国社会主流对数十年来俄罗斯生活的认识：“这一认识的实质就在于俄国是一个完全独特的国家和民族，不同于西方。”（А.Н. Пыпин 1873: 82）俄国需要通过对这一特性的确认来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体现自己在文化上的成熟：“俄罗斯生活被认为进入了自己最后的成熟期，被解释成不同于全欧洲的生活，甚至宣称以独特性与后者对抗。这一独特性赋予俄罗斯生活独立于欧洲发展潮流之外的状态，完全不同于欧洲。”（А.Н. Пыпин 1873: 79）换言之，卫国战争的胜利使得俄罗斯被冲昏了头脑，在追求独特性的路上舍本求末，为了坚持所谓的独特性而放弃了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在文学上，普希金、果戈理等一批知名作家思想也发生转变，对官方民族性进行了各有侧重的阐释和宣传。尤其是果戈理，一下子从一位敢于批判农奴制黑暗的作家化身为宣扬东正教，鼓吹沙皇专制的作家：“政论几乎局限于文学趣味上、轻浮的故事或小说、肤浅的文学批评、冷漠的历史或其它文章、游记和各种趣闻材料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实质内容。”（А.Н. Пыпин 1873: 98）这是令佩平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尤为痛心的。

佩平的论述有许多深刻之处，代表的也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沙皇统治意识形态的总体认识。不过，他谈论较多的是社会背景、政治、外交等问题，是从1870年代的政治形势来回头审视1830—1850年代的官方民族性，政治色彩较浓，同时也不无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更重要的是，佩平是自由主义的西方派，立场已经决定了立论。因此，佩平

的文章充满了“我注六经”式的偏见，以至于他直接把斯拉夫派等同于“蒙昧主义的同伙”，（А.Н. Пыпин 1873: 245）这是令波戈金极为不满的地方。

## 5 波戈金的反驳

1873年3月，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的《公民》（Гражданин）分四期发表了波戈金的文章《论斯拉夫派问题》，对于佩平的批判做出了回应。波戈金首先把佩平对斯拉夫派的指责与分裂教徒对东正教徒的批判做了对比，两者都是怀着仇恨用歪曲的方式攻击了自己的对手。因此，波戈金说：“在佩平的文章里有许多敏锐而坚实的观察，但总体上有大量错误、不准确以及居心叵测——更不必说他和他的读者都完全有权拥有的个人之见。”（М.П. Погодин 2010: 488）

作为亲历者，波戈金在文章里详细介绍了斯拉夫派的起源与发展情况，并对佩平的指责做了逐一答复：如，“斯拉夫派幻想着西方文明的没落及东方文明的崛起”“斯拉夫派对西方有着极端的仇恨”（М.П. Погодин 2010: 490）等等。波戈金认为这些说法都是不实之词，佩平本人也不认识任何一位现实中的斯拉夫派人士。事实上，早期的斯拉夫派比西方派更了解西方：霍米雅科夫对西欧文学如数家珍，对黑格尔也不陌生，他的《论英国书简》（1848）曾在俄国思想界激起反响。舍维廖夫更是精通多门语言，还写过关于莎士比亚、但丁等人的著作。相形之下，身为西方派的别林斯基仅能依靠俄国报纸和朋友的翻译来了解西方，即便后来更具代表性的赫尔岑对西方的关注也主要限于政治方面。相形之下，在波戈金看来，斯拉夫派对西方文明的把握其实更有依据，更为深刻，远非佩平自以为是的判断所能概括的。

谈到官方民族性，波戈金认为：“佩平先生发明了一个非常好的词：官方的、国家的民族性。遗憾的是，他没有好好解释其中意味，反而过于随意地运用了这一词语。”（М.П. Погодин 2010: 505）波戈金认为，不能把官方民族性等同于乌瓦罗夫的“专制、正教和民族性”三原则。因为后者只是乌瓦罗夫本人向沙皇递交的一份报告，官方并无明确发文去宣传推广这一观点，尽管有“许多熟悉历史、熟悉人民、熟悉生活的严肃的俄国人”（М.П. Погодин 2010: 506）已经接受了三原则。波戈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三原则本身是好的，但佩平硬给它加上“官方”的称呼，刻意强调它的官方色彩，而忽略了思想界对它真正的认可，这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做法，也是自由派攻击斯拉夫派时的常用手段。

作为波戈金晚年总结性的作品，波戈金在《论斯拉夫派问题》中还全文插入了一篇旧作《论俄罗斯古代》（1845），再度强调了俄国历史的独特性，与佩平西方派思想形成对话。作者认为：“像西欧一样，我们也有中世纪，但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我们也像西方一样完成了同样的进程；完成了一样的任务，只是方法不同；达到了一样的目标，只是道路不同。对于那些善于思索的欧洲史学家、哲学家来说，这些不同尤其构成了俄国史的趣味性和重要性。……无条件崇拜西方的时代已过去了，只有那些还没来得及学完旧课程的落伍者才会又去开始学新的。”（М.П. Погодин 2010: 246, 247）波戈金的这段话看似离题，实际上仍然围绕着俄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展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成败得失也有不同的标准。这一点，跟官方民族性强调的俄国民族特性也是内在呼应的。

## 6 结束语

波戈金自称是一位“热爱祖国，对欧洲心怀感激又祝福人类”（М.П. Погодин 1876: 1）的俄罗斯人，这说明，他并非那种通常意义上眼光狭隘的保守派历史学家。他对官方民族性的阐释，对佩平及自由派史学家的反驳，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有为官方唱赞歌的嫌疑，但从今天来看，也是对俄罗斯民族性的一次历史阐释，并非简单的学术跟风之举。

俄罗斯民族性与专制、东正教的复杂关系，显然不是简单的“自由与反动”这样的范畴所能涵盖。不妨回忆一下英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艾琳·凯利（Aileen Kelly）在为《俄国思想

家》所写导言开篇所举的那个例子：“为了向莫洛尔女士（Lady Ottoline Morrell）解释俄国革命，罗素（Bertrand Russell）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但这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只要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以赛亚·伯林 2001：1）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不可以说波戈金早就洞察了这一切呢？

#### 附注

1 需要说明的是，官方民族性实际上是佩平在 1873 年赋予的名字。在此之前，它一般被称为“乌瓦罗夫公式”（Уваровская формула）或“体制”（Система）。本文为论述方便，便不作此区分了。

2 “народность”既可译为民族性，又可译为人民性。实质上在 1830 年代俄国文坛，关于这一概念的争论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从普希金、果戈理到别林斯基等人对此做过具体的说明。详情请参见张铁夫：《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03 年第 1 期。或参见 Nicholas V Riasanovsky “Nationality “ in the State Ideology during the Reign of Nicholas I //The Russian Review Vol. 19, №.1 (Jan.1960), pp.38-46.官方民族性概念作为当时的一种阐释，因其官方背景而往往被人视为反动、蒙昧，实则不然。

#### 参考文献

- [1]Барсуков Н.П. Жизнь и труды М.П. Погодина. Книга 4.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огодин и Стасюлевич, 1891.
- [2]Зорин А. Идеология «православия-самодержавия-народности»: опыт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J].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6(26).
- [3]Казаков Н.И. Об одн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формуле николаевской эпохи[A]Контекст. Литератур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89.
- [4]Погодин М.П.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M].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10.
- [5]Погодин М.П.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трывки[M]. Москва: Типа. Августа Семена, 1846.
- [6]Погодин М.П. Взгляд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Парижского мира: 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газеты «Le Nord»[A] Погодин М.П. Стать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1856-1867)[C]. Москва: Типа. Августа Семена, 1876.
- [7]Пыпин А.Н.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мнений от двадцатых до пятидесятых годов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1873.
- [8]Уваров С.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сновы[M].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4.
- [9]Nicholas Riasanovsky. *Nicholas I &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1.
- [10]白晓红. 俄国斯拉夫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11]以赛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2]巴巴拉·杰拉维奇. 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 1814—1914[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13]梁赞诺夫斯基等. 俄国史(杨烨等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4]卢梭. 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5]徐凤林. 俄罗斯宗教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Pogodin, Pypin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Zhu Jian-gang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As the dominant ideology in the Nicholas I era, the Official Nationality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cultural aspects in Russian history. The academician Pypin made negative evaluations about it in 1873. That brought a rebuttal from the famous historian Pogodin. In fa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 of Official Nationality were revealed in this controversy.

**Key words:** Pogodin; Pypin; Official Nationality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5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15ZDB09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建刚 (1975—), 男,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俄苏文学、俄国思想史。

**收稿日期:** 2019-11-25

**[责任编辑: 刘 锐]**